

21世纪高师文科系列教材

张志忠◎主编

中国当代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UOPIN
DAODU

文学作品
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1世纪高师文科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导读

张志忠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导读/张志忠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

(21世纪高师文科系列教材)

ISBN 7-301-07627-4

I. 中… II. 张… III. 当代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842 号

本书有多位作者,由于种种困难,我社未能都联系上,请有关作者见书后主动告知通信地址,以便奉寄稿酬。

书 名: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导读

著作责任者: 张志忠 主编

责任编辑: 严胜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627-4/I·06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3.625 印张 483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编写说明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导读》为“21世纪高师文科系列教材”之一，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志忠教授主编，编写者皆为资深教授、副教授，他们从教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突出的科研水平。

本书以对中国当代文学典范作品的品评和鉴赏为中心内容，力求通过引导学生和其他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培养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和分析作品的能力。

本书分为“引论”、“作品选”和“作品导读”三个部分。

引论：在本书开头安排了一万余字的“概述”，分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历史进程、基本特征及其得失等方面，作了学术性的阐释。

作品选：根据文学史的评价和课程教学的需要，选取兼具审美价值和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

作品导读：为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 **作家介绍：**对作家的生卒年、籍贯、代表作等基本情况作简短的介绍。

(2) **作品分析：**对作品的思想命意、核心人物、文气意境、艺术手段等进行分析，力避面面俱到，力求抓住每篇作品最鲜明的特色，作个性化的阐释。

(3) **延伸性阅读书目：**列出学术界对所选作品的重要研究成果2—5篇(部)，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领会该作品提供具体的引导。

本书适用性强，应用面广，既可以用作高校中文专业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配套教材，也可以用作高校非中文专业的选修课教材，同时可以供文学爱好者阅读和自修。

2005年2月25日

目 录

引论 中国当代文学概观 张志忠(1)

第一编 小说

登记(节选)	赵树理(21)
铁木前传(节选)	孙 犁(33)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43)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节选)	王 蒙(50)
红豆(节选)	宗 璞(62)
百合花	茹志鹃(73)
红旗谱(存目)	梁 斌(82)
青春之歌(存目)	杨 沫(85)
创业史(第一部)(存目)	柳 青(88)
受戒	汪曾祺(91)
棋王(节选)	阿 城(107)
冈底斯的诱惑(存目)	马 原(122)
枯河	莫 言(124)
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 遥(135)
烦恼人生(存目)	池 莉(149)
活着(节选)	余 华(152)
白鹿原(节选)	陈忠实(172)

第二编 诗歌

漳河水(节选)	阮章竞(189)
波浪	蔡其矫(193)

吐鲁番情歌(二首)	闻 捷(196)
苹果树下	
舞会结束以后	
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201)
秋歌(之一)	郭小川(205)
回延安	贺敬之(209)
悬崖边的树	曾 卓(215)
巨灵	昌 耀(218)
回答	北 岛(223)
雪白的墙	梁小斌(226)
小春天的谣曲	顾 城(229)
交谈	江 河(232)
神女峰	舒 婷(236)
惠安女子	舒 婷(239)
女人	翟永明(242)
明月降临	韩 东(246)
亚洲铜	海 子(249)

第三编 散文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255)
荔枝蜜	杨 朔(261)
土地	秦 牧(266)
长江三日	刘白羽(273)
怀念萧珊	巴 金(282)
亡人逸事	孙 犁(293)
下放记别	杨 绛(298)
秦腔	贾平凹(305)
我与地坛	史铁生(312)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328)

第四编 戏剧

- | | |
|-----------------|------------------|
| 茶馆(节选)..... | 老 舍(343) |
| 关汉卿(节选)..... | 田 汉(356) |
| 陈毅市长(节选)..... | 沙叶新(366) |
| 绝对信号(节选) | 高行健(执笔)、刘会远(373) |
| 潘金莲(存目)..... | 魏明伦(384) |
| 狗儿爷涅槃(节选)..... | 刘锦云(386) |
| 天下第一楼(节选)..... | 何冀平(396) |
| 桑树坪纪事(节选)..... | 陈子度、杨健、朱晓平(406) |
| 思凡(节选)..... | 孟京辉(416) |
| 切·格瓦拉(存目) | 黄纪苏等(427) |

引论 中国当代文学概观

张志忠

一、开端与特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文学史家族中一门年轻而又充满勃勃生机的学科。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它实现了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选举产生了全国统一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在此前后，以及新中国的初建时期，《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全国性的和各省市文艺机构主办的各种文学艺术刊物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相继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各级报纸副刊对文艺作品和评论的推重，为作家艺术家发表创作和评论提供了充分的园地；新中国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则为文学提供了数量空前的读者群。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中国文学新时代的开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它迄今为止长达五十余年，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壮大，跨越新旧世纪之交的风雨历程。

如上所述，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它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体制性和意识形态性，在一种既定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前行，在许多年里，都明确地将自己从属于政治权威和“党性原则”之下。各级党政部门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指导和组织，这种

指导和组织,许多时候又是以理论阐释和文艺批评的方式出现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性特征是非常明确的。当代文学中与创作并行的理论建设和文艺批评,也由此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一直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至于高等院校中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得到确认,则是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随着当代文学时间长度的延伸,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兴盛,对当代文学现状的评论,对当代文学历程的追溯和总结,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放性特征,需要不断地追踪和评述当前的文学态势,不断地随着后来者的加入而调整文学史的格局,又使当代文学学科具有生机勃勃、不断向未来延伸的延展性和某种未完成性。作为当代社会生活和审美意识的折射和回应,当代文学与我们面对的生活现实具有最紧密最切近的关联,可以从当下的文学作品中体察时代的脉搏和社会心态的变迁,可以将二者进行相互印证和比较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是强调使命感、责任感的文学,中国作家一直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激发广大民众普遍参与现实、变革现实的热情,加入社会和历史的伟大进程,强烈的政治参与感和对民众的教育意识,以及随之而不能不坚守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些溢出了常规的文学研究之外的特性,又给我们进入当代文学提供了特殊的况味。

二、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想像

纵观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是什么?这就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想像。如果说,在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 20 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各国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斗争浪潮,以其风起云涌、互相呼应的姿态,书写了宏伟壮丽的历史篇章,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占世界第一位的现代独立国家的建立,就必然地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页。依照政治学家的论述,“构成民族国家本质内容的,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文

化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①;“一个富有成效的国家行为者应当在客观标准看来显示出同一国界内高度的文化统一性,在主观标准看来大多数人民对其政治体系保持信任”^②。在经历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长达一百一十年的苦难与辉煌,强敌入侵与瓜分危机,民族觉醒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的自救和抗争之后,在经历了内战与外战、改良与革命、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选择之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相应出现的国家的统一,民众的认同,文化的高度统一性,必然会激发起普泛的社会心理响应和诗人作家们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巨大期望和热烈认同。这种认同,既源于现实,也立足于理想,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向人民向民族庄严宣布的奋斗宗旨,为民族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也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沉浸 in 一种刚刚取得的巨大胜利的忘我狂欢之中,沉浸 in 一种对于“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美好未来的开怀畅想之中,理想激情的空前高涨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十年浩劫过后,进入历史的新时期,当代文学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的信任和认同,昂扬奋发的姿态,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未来在召唤”的心灵回应,仍然是其血脉中未曾冷却的炽热而殷红的鲜血。只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解从朦胧变得深刻而清晰,对实现民族现代化的目标更为明确,对曾经遭遇过的巨大挫折记忆犹新,因此,对现实的批判和反省,也成为追求理想的一个重要侧面了。

^① 这是北京大学教授宁骚对民族国家的界定。转引自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 22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西奥多·A·哥伦比斯:《权力与正义》。转引自《世界民族主义论》第 224~225 页。

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踪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这是何其芳的诗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从战争和苦难进入和平幸福的时代，人们的欢欣鼓舞用人间的语言已经难以表达，于是，来自天穹的隆隆雷声，便把这人间欢歌传遍四面八方。百余年间被列强肆意践踏的土地，百余年间的沉沦和屈辱，都在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中画上了句号。独立统一的国度，和平建设的热潮，城市底层民众的翻身解放，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展望，都凝聚在老舍的笔下，化作了《龙须沟》的今昔对比，和《茶馆》中一幕幕辛酸的往事的告别。“漳河水，九十九道湾，/漳河流水唱得欢：/桃花坞，长青树，/两岸踏成康庄路。/万年的古牢冲坍了！/万年的牢笼砸碎了！自由天飞自由鸟，/解放了的漳河永欢笑！”阮章竞的《漳河水》，则从乡村妇女翻身的欢欣中，进行今昔对比，告别苦难的昨天。

当然，回顾既往，不仅仅是追忆苦难，更重要的是对战争年代和革命斗争历程的热情而充满敬意的描述。新的政权不是在国会中竞选出来的，而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方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和浴血奋斗换来的，因此，对革命战争和历史风云的大规模刻画，就成为以艺术方式向社会民众论证新政权的充分合法性和作家对现实表示充分认同的重要路径。更何况，五六十年代这些英雄史诗的书写者，大多是从战争或地下斗争的生死线上走过来的，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刻的体验，对革命胜利有着由衷的自豪。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等当时名

重一时的作品，莫不渗入了作家的切身体验和身为革命者的自我肯定的双重蕴含。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肖平的《三月雪》……在建国初期，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支点。

与此同时，表现新的人物、新的时代，反映在新的社会体制下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奋斗、向往和歌吟，都是非常集中和富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乡村中大规模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经过了将近三十个年头的风风雨雨之后，最终代之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但是，当这一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它也曾激起诸多作家的热情追随和诚挚礼赞。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都是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避免了当时盛行的“写中心”、“写政策”的弊端，将一场触及亿万人生活与心灵的社会运动，融化在一幅幅或深刻或淡雅的乡村图画中，有的执著追寻社会演进的历史渊源，有的致力于民情风俗的敷衍，有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有的诗情浓郁，有的直面真实，有的别有襟抱。此外，表现中国最大商业城市上海的工商业改造的《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展现明末清初壮阔历史风云的《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歌颂 60 年代英雄人物的《欧阳海之歌》(金敬迈)，都是很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

在更多的时候，当新的时代生活和现实尚且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创作素材，当一个全新的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作家和诗人的热情洋溢未能在现实中一一找到对应，他们宁肯借助于强大的想像力，去咏赞那似乎是行将到来的美好现实。这种展望和向往，一方面是源于对丑陋污秽的旧世界的否定，一方面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描述，以及被夸大和美化了的苏联的社会现实及其建设成就。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像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将畅想未来以激励现在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生长点。强大的乐观主义，也许有些肤浅，但是绝对真诚。尤其是在一个贫困荒凉的国度，工业化建设的帷幕刚刚拉开，那些在后人看来也许平常

至极的事情,第一辆国产汽车的出厂,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完工,对于从无到有的开拓者来说,都是富有热烈的诗情的。当施工队伍面对一片空旷的山野,铁路还只是在工程师的图纸上,他们相信,“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邵燕祥《到远方去》)另一位诗人贺敬之,将这种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的图景,描绘得更加富有历史的纵深感:“在高压线/飞过的/长城脚下,/在联合收割机/滚动着的/大雁塔旁,/在长江大桥头的/黄鹤楼上,/在宝成铁路边的/古栈道旁……”(《放声歌唱》)作为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之一的贺敬之,他的诗歌创作量不是很大,每有新作,迭受称扬。从延安走来的贺敬之写过仿“信天游”体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政论与诗情结合的、中国古典式修辞方法与仿马雅可夫斯基“楼梯诗”相结合的抒情长诗《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与贺敬之齐名的是被誉为“战士诗人”的郭小川。郭小川诗歌创作甚勤,有抒情诗作《甘蔗林——青纱帐》、《望星空》、《团泊洼的秋天》、《林区三唱》、《秋歌》和长诗《白雪的赞歌》、《一个与八个》、《将军三部曲》、《深深的山谷》等。在同代诗人中,他对于自我的内省和对于人性的探求,都是最有深度的;取法于汉代铺陈张扬的赋体文而熔铸的“新赋体”,则是他对于当代诗歌体式的重要贡献。曾经以《王贵与李香香》名世的李季,仍然眷恋着大西北的热土,不过,他更多关注和咏赞的是玉门油矿的工人们,《玉门诗抄》和长篇叙事诗《杨高传》等为他赢得了“石油诗人”的美称。蔡其矫的诗作《雾中汉水》、《川江号子》、《南音》等,以艰辛劳作的生活形象与诗人内心不能自抑的悲悯情怀相结合,独标一格。闻捷的《天山牧歌》带来了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新时代的爱情之歌;展现新疆地区平叛斗争的《复仇的火焰》则是一部篇幅浩大、气势磅礴的叙事长诗。将典雅、考究的古典诗词意境与新时代军人生活相结合的诗人李瑛,他在60年代初期问世的《红柳集》标志着他诗歌风格的成熟。臧克家的《有的人》,何其芳的《回答》,艾青的《礁石》、《在智利的海岬上》,未央的《枪给我吧》,傅仇的《告别林场》,公刘的《西盟的早晨》、《上海夜歌》,郭风和柯蓝的散文诗等,都是

经历了时间河流淘洗的佳作。

散文领域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开了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先河。这一时期的散文佳作还有冰心的《樱花赞》，秦兆阳的《老羊工》，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庐山真面》，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叶圣陶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曹靖华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等。杨朔、秦牧和刘白羽则被认为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散文创作高潮的代表性作家。杨朔代表作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他拿散文当作诗来写，即景生情，借物咏怀，其得在于工于匠心，苦吟不已，构成一篇篇“美文”，同时也带来了雕琢太过的负面效应。至于今人所指责的杨朔散文背离现实苦难的弊端，恐怕未必应该由作者自己承担。秦牧的代表作有《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土地》、《花城》等，文笔海阔天空，摇曳多姿，用一个主题串珍珠项链般把一串串充满智性的散碎细节连缀起来，让人感受到知识之美，智慧之美。刘白羽的代表作有《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平明小札》等。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经历赋予他战士的豪情，中国革命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和经由苦难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化作他作品中雄奇险壮的自然景物，以及搏击风雨迎战光明的动态描述，构成独特的意境。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对时代英雄人物的状写，重要作品有徐迟的《祁连山下》，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陈广生、崔家骏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

建国初期的文学，曾经出现了两个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比较集中和醒目的瞬间。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界正式传达，这对于作家、艺术家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对繁荣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大批直面现实生活、针砭现实弊端和袒露个人情感矛盾冲突的作品得以涌现。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期，在遭受大跃进的狂热所带来的重大挫折，各个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之际，文学艺术也获得了短暂

的调整和松动,散文、杂文和历史题材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形成了一时间的热潮。其实,文学艺术的本性就是要在创新中求得发展,建国初十七年间,在不同条件下,作家为此作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都令人钦佩: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茹志鹃《百合花》、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绍棠《田野落霞》、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邓友梅《在悬崖上》、陈翔鹤《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黄秋耘《杜子美还家》等小说,流沙河《草木篇》、艾青《养花人的梦》、邵燕祥《贾桂香》等诗歌和散文诗,邓拓《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分别执笔的《三家村札记》等杂文,被称作“第四种剧本”的《同甘共苦》(岳野)、《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洞箫横吹》(海默)和历史剧作《关汉卿》(田汉)、《蔡文姬》(郭沫若)、《胆剑篇》(曹禺)……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却也可以见出那个年代里作家们的艰辛努力。

2.“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1966—1976)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各种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此伏彼起,政治对文学乃至社会的调控和干预也往往借文艺批评的方式进行。虽然每一次的具体情形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文坛的繁盛景象不再。尤其是在1957年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中,不论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还是有相当造诣和创作成就的老作家,许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进行创作以至正常工作的权利。由此,文学的表现领域越来越窄,风格和方式的多样性都黯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论——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现实,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限夸张和强化的政治工具理论;一种题材——工农兵斗争生活;一种创作方法——内涵无法明确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一种人物形象——集中了先进阶级意识和全部优秀品质的英雄模范人物;一种风格——高亢昂扬的高调叙述;一种批评尺度——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在这样强硬而呆板的规约下,文学自身越来越失去了弹性和活力,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样板戏和语录歌成为当时仅有的文艺作品,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戏”。1975年,毛泽东对文艺现状提出批评:“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电影”。与此同时,“四人帮”阴谋集团为了加快篡党

夺权的步伐,又抓紧炮制一批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如话剧《盛大的节日》、电影《反击》和“小靳庄诗歌运动”等,炮制了一批“阴谋文艺”的怪胎。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分为正式出版物和“地下文学”两种。前者指的是适应其时现实需要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和诗歌作品,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李心田的《闪亮的红星》、高红十等的《理想之歌》等。这些作品程度不同地打上时代的印记,甚至按照路线斗争理论演绎历史,创作者较好的文学素质则支撑了作品的基本框架。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是他后来创作“改革文学”的先声,是时代的一个异数。刘心武、谌容、张抗抗等一批新时期重要作家在这一阶段也有作品问世,虽然难以摆脱时风的影响,却也为他们在新时期的崛起积蓄力量,磨砺笔端。“地下文学”则是近年来被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其包容性很强,泛指一切没有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从前期的红卫兵诗歌到后期的知青歌曲,从在青少年中流传的“手抄本文学”到后来被称作“今天诗派”即“朦胧诗”重要诗人的诗作。十年动乱结束后,这些作品逐渐在正式出版物上出现,既表现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创作的另一侧面,也对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演进起了积极作用。食指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了知青文学的先河,也以其个人化的抒情方式和真挚的情感,对弥漫一时的“假、大、空”文风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反拨。其后,以多多、根子等为主的“白洋淀诗群”的形成,标志着知青诗歌的大规模展开。“九叶集”诗人穆旦和贵州青年诗人黄翔的一批诗作,是这一时代不可多得的心灵记忆和愤怒反叛。郭小川在1975年秋天所作《团泊洼的秋天》,“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总会生根发芽”,在特定环境下迸发出抗争和困惑的交织情绪,也预告了1976年清明时节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悼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爆发。在这次斗争中,民众自发地以诗歌、挽联等为武器,表达民族觉醒的怒吼,集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和众多民众参与于一身,形成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景观。相关的作品后来辑录为《天安门

诗抄》，此外还有各地编辑的“四五”诗歌选等。“地下文学”中的小说现象较为复杂，既有以言情的方式写成的《第二次握手》（张扬），也有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哲理沉思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波动》（赵振开）、《公开的情书》（靳凡）；绝迹多年后重新出现的惊险侦探小说《一只绣花鞋》、《梅花党案件》等，也填补了人们的阅读空白。

3.“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1976—1989）

尽管在时代的前行中，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学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挫折和创伤，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巨大灾难往往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特殊手段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从组织上清除了危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巨大隐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赋予人们评价历史和考察现实的强大思想武器，指引人们从现代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泥淖中超拔出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我们经常要提到的“新时期”。

历史对于文学的馈赠是非常丰厚的。文学艺术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建国以来的一桩桩冤假错案被纠正，许多无辜落难的作家重返文坛，一批批年轻的文学新人不断涌现，作家群体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在经过长期的精神生活的贫乏苍白之后，人们对于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迫切需要，曾经形成“一佳作出，洛阳纸贵”的盛况。为数众多的文学类报刊（例如建国初十七年，大型文学刊物只有上海的《收获》，而且还时出时停，“新时期”以来，篇幅达200页以上的大型文学期刊发展到数十家），和众多的文艺出版社的成立（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独立的文艺出版社），为作家施展身手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文学以其敏锐的思想锋芒和形象的震撼力，充当了披坚执锐、拨乱反正的先锋，密切关注现实，痛切追询历史，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疾声呐喊。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末期十余年的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鲁迅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